

屈原的思想与文学艺术

曹大中 著

责任编辑：许久文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字数：170,000 印数：1—2,000

ISBN 7-5438-0208-2

I·14 定价：6.25元

总 序

陈彬藩

屈原是中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四十余年前，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曾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闻先生在这里使用了“唯一”二字。他的这个评价，是经过历史的分析和比较得出的，并非随意给古人加上的桂冠。

屈原“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捲起了一次诗歌革命的风暴”（郭沫若语），将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对后世文学的发展，特别是辞赋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屈原的《楚辞》和《诗经》，同为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两座巍峨的高峰。东汉王逸称屈原之赋是“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梁代刘勰《文心雕龙》赞屈原辞赋“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盛唐李白美称“屈平辞赋悬日月”；鲁迅盛誉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凡此千古文坛巨子对屈原作品的推崇，稽诸屈氏之文章，信非虚美。然而屈原的伟大，却不不但由于他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错落的文学新体裁，实现了诗歌形体的一次大变革，并最先把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溶于一体，为后世树立了

二者结合的优良典范。屈原的伟大，尤在他执着的爱国精神和崇高的人格追求。屈原诗歌之所以冠盖古今，正在它熔进步的思想内容和超凡的艺术创造于一炉，而臻于情文并茂、义艺双绝的境地。

屈原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爱国者。他不计个人宠辱安危，为之终身奋斗的政治目标，就是祖国的富强和政治的修明。

“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埃。”

(《惜往日》)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离骚》)

他热爱祖国，对祖国故土怀有深沉的情愫，虽屡遭谗被逐，却宁死不忍离去：

“陟陛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离骚》)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

“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

鸟飞返故乡兮，孤死必首丘。”

(《哀郢》)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抽思》)

他热爱人民，同情人民，长期的流浪生活，使他有较多的机会接触人民，了解人民的疾苦，因而在其作品中体现了较多的人民性和民本思想：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

（《离骚》）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怒。”

（《哀郢》）

“愿摇起以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

（《抽思》）

屈原非常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与锻炼，终生汲汲于自身人格美的追求：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离骚》）

“重仁龚义兮，谨厚以为末。”

（《怀沙》）

“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彰。”

（《思美人》）

在《橘颂》中，屈原借赞美橘的品质，表达了自己人格美的理想。

“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屈原忠贞耿介、矢志不移、宁死不屈的坚强品格，更是垂范百代，曾给后世那些为追求真理、坚持正义而斗争的志士仁人增添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离骚》中，他反复呈辞，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在《渔父》中，屈原借答渔父之问表明自己的心迹：“宁赴湘流，葬于江渔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垢乎？”当需要坚守真理、正义、人格的时候，他是何等的决绝！

屈原爱祖国，爱人民的政治理想，秉德无私，刚正不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坚持真理和正义而“九死不悔”的崇高人格，在其作品中凝结为一种被称之为“屈原精神”的东西。这种精神，经过屈原《楚辞》这一通体光华的文学载体而流传千古。她有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日复一日地浸润着中华民族文化之沃土，潜移默化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优秀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多少为民族、为人民、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曾

从屈原作品中吸取精神力量，而蔚成民族的浩然正气；又有多少人在为正义的斗争中横遭压迫，遇到困难，饱经挫折，感到灰心的时候，由于受到屈原精神的鼓舞而勇气倍增；几乎可以说，我们民族一切有骨气的人莫不被其芳泽，只是有或深或浅，或隐或显，或自觉或不自觉的不同罢了。从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诗句中，不是都可隐约见到屈原精神感召和影响么！屈原是中华文明的骄傲，屈原精神是永存的。

屈原不但属于中国，也是属于世界的。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作品，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即被陆续翻译为德、法、英、意、日、俄等国文字，在各国人民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屈原的爱国精神、崇高人格、艺术造诣为各国人民所景仰。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推崇屈原为世界文化名人，就说明了这一点。屈原的作品，是中华民族奉献于人类文明的一颗璀璨的瑰宝。

我国当前正面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性任务。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4卷3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现代文明是历史文明的持续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只能植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土壤。以往任何形态的文化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既有其阶级性、时代性的局限，又有其继承性和借鉴性的功用。我们当然不能食古不化，更应摒弃民族虚无主义。对于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必要的整理、加工、总结、批判、继承，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今天研究屈原，弘扬屈原精神，正是为着凭借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片沃土，

按照新的历史要求，培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奇葩。我们楚辞学界的同仁，与其它精神文明建设者一样，都是为着这朵奇葩茁壮成长而辛勤耕耘的园丁，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依仗大家的共同努力，屈原精神必将在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放出新的异采。

湖南是屈原晚年活动和殉国投江之地。屈原作品中，有不少是在今湘北、湘西一带写成的。如《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涉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入溁浦余儗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怀沙》乱辞：“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昔往日》：“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湘君》：“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驾飞龙兮北征，遑吾道兮洞庭”，“捐余袂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湘夫人》：“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裸兮醴浦”。正因为屈原晚年曾在湖湘一带活动多年，他的许多作品又是在湖湘一带创作的，并最后“伏清白以死直”于汨罗江，在湖南人民中一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所以湖南人民对屈原有着特别亲切的感情，深受屈原精神的感染和鼓舞。自古以来，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日，都要以赛龙舟，吃粽子等方式纪念他。因而在研究屈原，弘扬屈原精神方面，我省楚辞学者有责任，也有条件作出更多的贡献。现在，湖南出版社决定从今年开始陆续出版《屈原研究丛书》，这对我省的屈原研究工作，无疑将是一个很好的推动。继今年出版的易重廉先生的《中国楚辞学史》，曹大中先生的《屈原的思想与文学艺术》之后，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1991年3月于长沙

序 言

羊春秋

我粗略地读完了曹大中先生所著《屈原的思想与文学艺术》一稿，觉得其中胜义叠出，只眼独具，卓论宏识，足以破旧说而树新义，不禁为之击节不已。若非精研先秦诸子之书、古今楚辞之学，而又深思明辨，豁然贯通，怎么能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如此犀利而通脱呢？可以想见其心游万仞，思接千载，驱使百家，擒纵六艺，剖玉出珠，去伪存真时的心态，是“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当然，曹君的新论，并不是“顺合众心，不违人意，百人读之莫讎，千人闻之莫怪”的。而往往是一石投水，洪波千叠，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反响，或是其所是，或非其所非，议论纷纭，难衷一是。“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曹君之文，即使是“大羹”“至宝”，有一点“淡味”或“瑕秽”，也是可以理解的。何况曹文本来不是从众顺俗、循旧守常之作，某些观点，一时难以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更是很自然的。所谓“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无因而至前，匹夫犹或按剑”，又何怪乎众口之囁囁也。不管世之论者如何，曹文甚辩而有据，绝不是以“怠心易之”，以“矜气作之”者，则是的的然无疑的。因就其所见，进一步论列如下，以俟时贤之讥弹。

(1) 观点务新：如说先秦无爱国观，《山鬼》是屈原的自我写

照,《橘颂》是屈原的绝笔,《招魂》是屈原招楚国先王之魂等等,都是把屈原放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和时代思潮中来考察的,尽管有的问题前人已经提了出来,但提出的角度与论证的方法是迥然不同的。即以屈原有无“爱国观”而论,自刘安、马迁以来,都对他的忠君思想作出了“可与日月争光”的崇高评价。在楚辞研究史上第一次提出屈原的“爱国观”的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那是基于当时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主战主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日益激烈而提出来的。特别是郭沫若在《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一文中,把屈原的爱国思想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于是屈原便由忠君的典型成为爱国的典型了。曹君通过丰富的内证(即屈赋二十五篇的内容)和外证(即先秦诸子言论和先秦史籍所载史事),论证了屈原的眷顾楚国、怀沙自沉,并非出于爱国的动机,而是由于既为楚王委质之臣,又与王室有血族关系的缘故。这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的;也是无损于屈原的伟大形象,给屈原以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的。

(2) 材料务实:曹君夙长汲深,取精用宏,在论文中旁征博引,左右逢源,论证某一个观点,引出某一种新解,都建立在经过认真鉴别、分析的大量思想资料和历史事件之上,绝不是逞臆说,恣口辩,以快意于一时,以致“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者。如在《“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中,列举了《三礼》《三传》《管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论语》《孟子》《国语》《国策》等先秦古籍,都只说了君主应该爱民、顺民、养民、利民、安民、保民,才能加强其统治,而没有提出要求人民爱国的。在《再谈“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中,又列举了共主周天子致胙、致伯于诸侯、诸侯致贡、受命于天子的史料十一条,来说明战国时代的“七雄”,不过是国中之国,是诸侯割据,而不是什么

主权独立国家，因而朝秦暮楚，不为卖国；委质尽忠，不是爱国。在《三谈“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中，又提出孔子、孟子、墨子、柳下惠、公山不狃、以及屈原的言行等十一问，是否存在爱国观念的问题，曹文无不以考覈为凭，以征实为重，论发胸臆，文成手中，作出了令人心折的回答。在《论先秦无爱国观》一文中，又从《左传》《国策》《管子》《韩非子》中，摘举保卫社稷的十三个事例，说明那些都是忠君的具体表现，而不是爱国的政治观念。条分缕析，信而有征，足以破论敌之疑，定是非之正。正因为文章是让材料来说话，所以具有令人首肯的说服力。

(3) 论证务密：“辩论是非，言不得巧”，这是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所提出的准则；但进行论证，理务求密。密就密在逻辑性强，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从提出论点，列举论据，到进行论证，延伸论点，都要周到严密，无懈可击，才能推导出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和论敌观点的虚假性。曹文在论证过程中，总是善于设问发覆，批亢捣虚，从正反两个方面，排比自己的论据，组织自己的论点，形成自己合乎逻辑的判断。如在《论先秦无爱国观》一文中，已经充分而有力地正面论证了先秦典籍中没有爱国观念的记载；又将可能被人们引用作为“爱国”或“卖国”的例证来反驳自己的论点的材料，尽可能完备地列举出来，一一加以分析、诠释，以进一步深化自己的论点，延伸自己的论点，使之向多层次多侧面扩展，让人们对自己所提出的论点获得全面的辩证的认识。据曹君稽考，先秦古籍中提到“爱国”的，有《墨子·兼爱》的“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国语·楚语下》的“君实有国而不爱”，《国策·周策》的“周君岂能无爱国哉？”《国策·秦策》的“臣闻明主爱其国”。提到“卖国”的有司马迁根据先秦古籍改写的《史记·晋世家》的“郑人或卖其国于秦，秦穆公发兵往袭郑。”《张仪列

传》的“群臣多谗张仪曰：‘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苏秦列传》的“人有毁苏秦者曰：‘左右卖国反复之臣也，将作乱。’”经过曹君用“诠释法”进行分析、比较，从划清概念着眼，没有一条可以作为固定而明确的政治道德观念。至于《史记》所引有关“卖国”的三条，将《左传》《国策》的有关条文对照来看，完全是司马迁在改写中注入了自己的感情色彩和时代色彩，离开先秦古籍的原貌有很大的距离。从而弄清了那些似是而非的材料，是以假乱真、混淆是非的。

(4) 陈言务去：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介绍了自己学习古文的经验，提出了“唯陈言之务去”的光辉思想，主张在语言的运用上，力戒陈腐的言论。曹君在这些论文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力去陈言，自铸伟辞，用自己的语言，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绝不在班、马之前，“募缘残溺，盗窃剩矢。”既不取前人之辞而变其意，又不取前人之意而变其辞，貌同而心异者，固所不屑；貌异而心同者，亦所不为。而是含英咀华，推陈出新，创造出一种具有个人风格和时代色彩的文风，收到了存神遗迹、得鱼忘筌的艺术效果。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因而必然受到社会现实的制约。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先秦时代的中国，处在一种混一的局面与混一的认识之中，爱国思想所赖以产生的客观局面尚未出现，爱国思想自然不能先于其母体而生。“联藻于日月”的屈赋，称尧舜之耿介，讥桀纣之披猖，誓九死而不悔，嗟黄昏之改期，其忠君忧国之忱，溢于言表，然而竟无只言片语涉及到爱国的原则，难道不是他那“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文心·时序》）么？难道不是“此《离骚》之作，其人与时为之也”（程廷祚《骚赋论上》）么？曹君正是善于在意识形态上观其通而会其变，窥其文而见其质，才得出屈原无爱国观念

之判断。与“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有着质的区别。因为他不仅能够创造性地在“发胸中之思”时不因袭前人，而且能够在“极笔墨之力”时敢创为新说。故能超而又超，奇而又奇，识超常人，言奇常论。王充说：“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论衡·案书》），我读曹君之文，恍惚产生了这样的认识，故为之书数纸于卷首，以见我的推服之诚。是否称美过善，言事增华，有人出而“疾虚妄”，则非我之所计也。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三月

于湘潭大学之迎旭轩

目 录

“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	(1)
再谈“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	(12)
三谈“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 ——答雷庆翼同志·····	(22)
从伍子胥事件看屈原爱国观念的有无·····	(36)
论先秦无爱国观 ——答吴代芳同志·····	(42)
《九歌》没有托之以讽谏的用意吗 ——论屈原爱情诗与游国恩的有关楚辞研究·····	(53)
山鬼——屈原的自我写照·····	(68)
论《九歌》人神相恋的文学系统·····	(75)
《惜诵》《抽思》《思美人》作于怀王时代考辨·····	(86)
说《涉江》·····	(98)
论《哀郢》·····	(106)
《怀沙》新解 ——怀沙即心伤·····	(121)
《橘颂》确是屈原的绝笔·····	(128)
招魂——屈原招楚国先王之魂·····	(141)
屈原的女性癖与恋君情结·····	(155)
论屈原的迷狂·····	(168)
花草树木与屈赋的文学魅力·····	(186)

屈赋非扬雄所说“诗人之赋”辩……………(194)

从屈原想到许穆夫人及其作品……………(200)

屈原的人格修饰美与庄周的人性天然美……………(206)

引用书目……………(219)

“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

长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几乎一致认为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诚然，屈原的诗篇反映了他建设强大楚国进而统一天下的顽强意志，表现了他与危害楚国的奸臣誓不两立的斗争精神和对楚国人民的深切关注。他对国君的无限忠诚，治理国家的卓越才华，鄙于世俗的光洁品质，竟招来了潜毁与暗算，以至见疑于怀襄，蒙疏被放。在这陈志无门，进退无路的困境之中，他仍然不愿离开楚国，外仕他邦，直至不忍目睹楚国的败亡而怀沙自沉。屈原的这种重大的政治行动，鲜明的政治观点，岿然泥而不滓的高尚情怀，到底是不是从爱国这一重大原则出发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仔细考察先秦的社会政治思想、社会道德和他本人的诗作，以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结论。

第一，在先秦时代，在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并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与区别，因此也就不存在“热爱祖国”的观念。

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国不叫中国^①，而叫天下，叫四海。当时人们认为，从千里王畿起，直至极远之处，都属于中国。《国语·周语》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与此相近的记载，在《尚书》的《益稷》《禹贡》《康诰》等篇中都有。所以按照先秦时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看来，中国即世界，天下即中国。这种观点渗透在先秦的一切古籍与人物的思想行动之中。不仅中原华夏各国承认

这一点，即使是当时遭鄙视的所谓四夷诸族，也是承认这一点的。如齐桓公伐楚，管仲代齐桓公质问楚国：“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楚国使者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③这段记载说明了，不但齐国认为楚国应向周天子纳贡，即认为楚国应服事周天子，是周的一部分，而楚国本身也是承认这一点的。所以《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③所以汤伐桀，武王伐纣，秦灭六国，都不是一国征服另一国，而叫做王天下，是一个国家的内部斗争，它与秦汉以后的外族入侵相比，其本质是完全不相同的。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④列宁在这里强调了“自己祖国”一词。所谓“自己祖国”就是与外国相对立而言的。如果没有外国的存在，“自己祖国”的概念也就无从产生了。由此可知爱国主义思想的产生是以客观世界存在着自己祖国与外国的对立为前提的。先秦时代的中国又处在一种混一的局面与混一的认识之中，爱国思想所赖以产生的客观局面尚未出现，那么，爱国思想当然就不能先其母体而出世了。

第二，如果屈原政治行动的动机是出于爱国，那么在当时受爱国思想支配而行动起来的人，就决不只是屈原一个，而将是大批的政治家、思想家，许许多多的民族集团。恩格斯指出，“在研究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的动力，研究历史的真正发展的动力的时候，所应该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杰出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推动整个阶级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动机。”^⑤我认为，这种推动整个民族行动起来的爱国思想，必将在当时的历史和政治思想著作中，广泛而鲜明地反映出来。但我们遍检先秦古籍，虽然很多著作都论述过“忠君”，却没有一家论述过爱国。

例如，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却也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⑥ 墨子学说的中心是兼爱，但也指出“君臣相爱则惠忠”。^⑦《吕氏春秋》也说：“为人臣不忠贞，罪也。”^⑧《诗》《左传》《国语》《国策》《荀子》等古籍都渗透着忠君的思想，却均未谈到爱国这种重大问题。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国语·晋语》中，记载了一个把忠君与热爱国土人民明显分开的故事：“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来。令鼓人各复其所，非僚勿从。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军吏执之，辞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岂曰土臣？今君实迁，臣何赖于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尔心（当作止）事君，吾定尔爵禄。’对曰：‘臣委质于狄之鼓，未委质于晋之鼓也。臣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委质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无叛质。敢即私利以烦司寇而乱旧法，其若不虞何！’”这个故事说明，委质为臣之人，只讲忠君，而对于构成为祖国重要因素的土地与人民是可以完全不顾的。夙沙釐声称这是古之旧法，如果违反了，晋国的司寇也会依法惩处的。可见这种制度并非仅是夷狄之法，实为华夏诸夷共行的古法。这个故事最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只存在忠君的原则，而不存在爱国的意识了。

诚然，我们这里说的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而不是把国家当作一人一姓的私产来爱的“爱国”。对于后者，先秦古籍倒是有偶尔提及的。如《墨子·兼爱》说：“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战国策·西周策》说：“周君岂能无爱国哉。”这一类的所谓“爱国”，与我们所要论述的爱国，其含义是迥然不同的。

第三，在先秦时代，普通平民对某一国所采取的或去、或就、或留的态度，并不是他爱国与否的标志。因此，即使屈原的身份